

稳增长与调结构面临的问题

吕 政

内容提要 中国经济发展条件出现了重要变化,经济增长趋势将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速增长。要实现经济稳定增长,必须保持适度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和扩大国内需求。结构调整既要继续发挥比较优势,更要增强竞争优势。在积极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同时,更要立足现有产业,瞄准与工业发达国家的差距,在技术密集型产业领域缩小差距。服务业的发展主要取决于经济发展阶段的客观条件,也受政策环境的制约。解决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问题的关键是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劳动力在城镇有稳定的就业机会并纳入城镇社会保障体系。

关键词 经济增长 结构调整

中图分类号:F1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36(2013)01-0005-05

经过 30 多年的发展,中国经济增长趋势出现了新的变化,GDP 增长率将从 10% 左右转向 7%~8% 的中速增长,工业增加值将从 16% 以上的高速增长转向 10% 左右的较快增长。经济发展条件的变化决定了今后继续保持过去 10 年的高速增长是不可能的。企业、政府以及社会的各个方面都需要调整对未来经济增长的预期,解决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突出矛盾,探索在经济增长速度趋缓之后的应对办法。

一、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与结构问题

保持适度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仍然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2002~2011 年的 10 年间,中国每年积累率平均在 43% 以上,2006 年以来超过了 45%。这是过去 10 年中国经济,特别是能源原材料等重化工业持续高速增长的主要原因。从积极的方面考察,较高的积累率扩大了工业生产能力,加快了城镇化的进程,加强了基础设施建设,增加了政府财政收入,增强了国家的综合实力。然而积累率过高带来的问题也很突出,比如抑制了城乡居民的消费规模和水平,带动了重化工业生产能力的过度扩张,抬高了土地等资源性产品的价格和制造业的生产成本。如何在降低积累率、提高消费率的同时,保持适当的积累率是宏观经济决策和调控必须解决的问题。

按照一般经济规律,经济增长率等于积累率除以投入产出系数。由于投资的有机构成的提高,中国投入产出系数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前的 3 左右上升到过去 10 年平均为 5 左右。在积累率接近 50% 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增长率也在 10% 左右。实际的经济增长率与理论增长率基本一致。这一经验数字表明,到 2020 年要实现经济总量比 2010 年翻一番的目标,经济年均增长率应保持在 7%~8% 的水平,积累率也应当保持在 36%~40%。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速度按不变价格计算,应当保持在 18% 左右。

收稿日期:2012-11-25

作者简介: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经济学部副主任,北京,100732。

在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持续增长的同时,必须把握好投资方向和优化投资结构。由于过去10年间工业生产能力的迅速扩张,中国目前除清洁能源和高附加值产品外,大多数工业行业的生产能力已相对过剩。继续扩大一般制造业的生产能力,将遇到市场需求约束的限制。在基础设施建设中,高速公路建设进入后期,高速铁路建设虽然处于高峰期,但受到融资体制未来盈利和偿还贷款能力的制约,港口建设也进入低增长的阶段;城市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还有广阔的投资空间,但大多属于非盈利性质的投入,其规模和速度取决于地方政府的投融资能力。因此,固定资产投资方向和结构,首先要着眼于增强经济发展后劲,着眼于促进产业升级,着眼于增强创造财富能力的领域。尤其要增强企业积累能力,增加对企业技术创新和技术改造的投入,使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奠定在新的生产力基础上。必须摒弃依靠城市扩张、拆迁,依靠形象工程和标志性建筑,依靠举办运动会、博览会等运动式、跃进式、突击式的固定资产投资模式。

二、扩大国内消费需求问题

社会扩大再生产理论揭示的经济规律是,生产决定消费,但消费也反过来决定生产。如果消费被限制在狭小的范围,商品难以通过流通和分配环节进入消费,就会出现生产能力过剩,并将导致企业减产、停工甚至倒闭。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商品卖不出去,摔碎的不是商品而是商品生产者。因此,追求经济增长必须改变重生产能力扩张、轻消费市场开拓的思想,遵循社会扩大再生产的经济规律,充分认识扩大国内需求对实现经济持续增长的战略意义。

调节收入分配关系。分配结构不合理,这是制约需求增长的重要因素。调节收入分配差距,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是扩大消费需求的前提条件。调节的重点是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一是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继续实行结构性减税政策,特别是对小型和微型企业的减税,提高企业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所得的比例;二是调节资本与劳动者之间的分配关系;三是抑制垄断行业的过高收入,缩小行业收入差距。

农民货币收入低是有效需求不足的主要原因。2011年中国9亿农民的纯收入为人均6977元,其中现金收入占全年纯收入的50%,为3488.5元。即使9亿农民当年的现金收入全部用于购买消费品,也只有31396亿元,仅相当于当年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1万亿元的15%。因此,提高农民收入水平,是扩大居民消费需求的突出难点。

另外,改善消费环境就是规范生产经营主体的市场行为,健全流通秩序,形成合理的价格体系和定价机制,保证消费者能够方便、放心地买到质量合格、价格合理、物有所值的商品和服务。

降低流通费用,保持价格基本稳定。价格高低是影响消费的最直接因素。生产成本、流通成本以及市场供求关系决定商品价格。降低流通费用的途径是:优化生产力布局,减少不合理运输;理顺铁路、公路运输收费标准和机制;调整物流业的产业组织,建设社会化的现代物流体系,减少流通环节,避免层层加价;调整商业、服务业税费;规范和降低零售商业的场租费用。

三、保持劳动力便宜的比较优势问题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劳动力成本逐年上升。沿海地区制造业企业工人的平均月工资已经由2000年的800~1000元上升到目前的2500元左右。按照汇率换算,由10年前相当于美国制造业平均工资的9%上升到2012年的15%左右。

中国劳动工资水平上升是必然趋势。原因有几个:一是持续30年的计划生育政策,使中国人口总量已进入低增长时期,城乡青壮年劳动力的比例在下降,劳动力供求关系正在发生变化;二是农村政策的调整,农民收入的提高。不外出务工的农民在当地非正规就业的机会和收入水平都在增加;三是社会必要劳动费用上升,即购买家庭必需生活资料的费用支出和用于子女教育的费用逐年上升。在这一背景下,企业继续维持过低的工资水平,将难以保证劳动力的供给。因此,中国劳动力成本便宜的比较优势正在发生变化,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将逐

渐削弱。这是日本、韩国,以及中国台湾、香港等地区工业发展过程中都曾出现过的现象。

如何应对劳动力成本上升的问题,一种主张是调整计划生育政策,以延长“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力。对计划生育政策实行微调是必要的,但必须看到中国现阶段和今后较长一个时期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人口多与资源供给不足、环境保护压力大的矛盾。到2030年中国人口顶峰预计达到14.5亿,其中劳动年龄人口仍然超过7亿。不能离开技术进步、产业结构调整和提高劳动生产率来讨论人口政策。按现行汇率换算,中国工业增加值略高于美国、日本和德国,但美国制造业的劳动力总数为2100万人,日本2000万人,德国1900万人,中国超过1亿人,是他们的5倍以上。这说明中国工业结构在国际分工体系中以附加价值低的产业为主。推进产业结构升级、提高劳动生产率是解决劳动力成本上升的根本出路。

另外,与发达国家之间的产业结构互补性并没有出现根本性的变化,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也不可能重新恢复劳动密集型产业。与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工业的配套体系、产业链的完整性,能源和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条件是工资更低的发展中国家现阶段还难以达到的。因此,从客观条件看,中国在未来10年或更长一个时期,继续发挥劳动力成本相对便宜的比较优势是必要的和可能的。政府应当创造有利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条件,企业应当通过改善劳动组织、增强技术创新能力、提高劳动生产率、培育品牌等途径,化解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困难。

四、推进产业升级问题

产业升级包含两个方面的任务,一是对传统产业进行改造,提高传统产业的生产技术水平,推进传统产业产品的升级换代,提高产品附加值;二是以高新技术产业替代传统产业,提高战略性新兴产业在工业中的比重。

现阶段产业升级的重点,首先是推进现有产业的技术和产品的升级,找准与美国、德国、日本等工业先进国家的差距,实现技术赶超。在钢铁工业、有色金属工业、非金属材料工业、石油化学工业、高性能和智能化机械装备制造制造业,高速铁路装备制造制造业、精密仪器装备制造制造业、电子通信设备制造制造业、精细化工制造制造业、新药研发和生产等高附加值产业领域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并显著增强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依靠产业升级改善国际贸易条件。

在与日本、韩国等国家和地区之间的进出口贸易中,中国每年有2000多亿美元的贸易逆差。中国的出口以劳动密集型产品和农副产品为主,进口以高附加值的机械、电子和精细化工产品为主。在这些行业,如果国内的生产技术水平和产品性能能够达到工业先进国家和地区的水平,减少对进口的依赖,贸易逆差就会显著缩小,国际贸易条件将不会因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竞争力下降而恶化。例如,目前中国进口一架波音中型客机需要1.05亿美元。中国服装产品出口的平均单价为3.5美元,要出口3000万件衬衫才能买一架波音中型客机。生产3000万件衬衫要1万名工人工作1年,同时还需要4200万米的服装面料。在纺织服装行业工人工资和能源原材料成本继续上升的情况下,企业的利润不断下降甚至出现亏损。要改变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这种局面,出路有两个:一是纺织服装行业在提高出口产品品质和培育自主品牌的基础上提高出口单价;二是实现国产民用干线飞机从研发到批量生产的突破,逐步减少民用干线飞机的进口。

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对未来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升级和提高国际竞争力有全局性影响的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特点是:技术密集,以技术创新为支撑,产品附加价值高,产业关联度高,带动性强,技术渗透性强。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需要在以下10个方面创造条件:(1)对未来科技进步方向做出准确判断;(2)依靠自主研发获得关键的技术;(3)具有将科技创新成果工程化、产业化和市场化的动力和能力;(4)具有先进制造业的配套能力;(5)政府的扶持力度与民间投资积极性;(6)核心龙头企业的技术集成能力;(7)专业化的中小企业配套体系;(8)以企业为主导的产学研结合的机制和组织方式;(9)高科技人才的凝聚力;(10)企业家追求创新发展的价值理念。

在一定意义上说,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比神舟工程、登月工程、航母工程和建空间站还要难。因为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不仅需要高新技术做支撑,更要把高新技术产业化、市场化和规模化,并具有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

战略性新兴产业在起步阶段技术成熟度较低、市场不确定因素多,企业投资性现金流出多、经营性现金流入少,企业规模较小,抗市场风险能力、短期偿债能力差。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需要国家财政、金融扶持和市场化的风险投资相结合,帮助新兴产业的初创企业完成技术成果研发、商业化,并最终形成具有市场竞争力的产业。

五、促进服务业的发展问题

中国服务业的增加值平均每年增长10%左右,与国民经济增长速度基本同步。中国服务业在国民经济构成中约占44%,比美国低30个百分点。这个比例反映了不同发展阶段的客观现实。服务业的发展有其客观规律,政府政策只能因势利导,而不应拔苗助长。

第一,服务业的发展规模和水平,首先取决于第一、二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和增加值率的高低,在第一、二产业投入产出效率较高的情况下,在第一、二产业就业的人口及其家庭才有更高的支付能力去购买服务业提供的服务;第一、二产业经济效益好,才能上交更多的税收,使政府有更强的财政支出能力扩大公共服务建设,增加对第三产业的需求。总之,第一、二产业的发展是服务业的物质基础。

第二,服务业的发展取决于城市化程度。1980年到2011年中国城镇化从19%上升到51.3%,服务业的比重也从18%上升到44%,二者基本上是同步的。人口的集聚是服务业实现其规模效应的基础,这也是北京、上海、广州等中心城市服务业比重高的主要原因。

第三,生产与生活方式的社会化分工和商品化程度决定了服务业的发展程度。当广大农村的几亿农民仍然在许多方面保持自给自足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的时候,服务业发展必然要受到制约。所以,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途径是提高第一、二产业的效率,加快城镇化的进程,提高社会化分工的程度。

第四,取决于政府政策。城市管理要有利于扩大就业,为各种层次服务业的发展创造条件。政府应建立公平、规范、透明的市场准入标准,探索适合新型服务业态发展的市场管理办法,调整税费和土地、水、电等要素价格政策,制止滥收费,营造有利于服务业发展的政策和体制环境。必须处理好市场监管与增强市场活力的关系,不应当为了城市形象而限制个体工商户自谋职业的机会和空间。

六、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调整了传统工业化限制农业劳动力流动的政策,加快了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促进了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的转移。中国城镇化的进程显著加快,有2亿多农村劳动转移到城镇,目前城镇人口已超过农村人口。但是农民向城镇和非农产业的转移仍然是不稳定的。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问题十分突出。

1. 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特点

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农村劳动力转移主要依靠兴办乡镇企业吸收剩余农业劳动力,其特点是离土不离乡。实践证明,分散的乡镇企业不符合现代工业发展的要求。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大批乡镇企业停产倒闭,或向县及县以上的中心城市搬迁和集中。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特点是离乡但不离土,农村还有家产、土地和妻儿。转移出来的2亿多农民,并没有真正融入城市,大多是游离于乡村与城市、农业和非农产业之间的群体。他们在城市没有长期稳定的工作岗位,没有像样的住房,没有纳入城市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体系。因此,把农民工统计为城镇人口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城镇化。

2. 农民“穿衣戴帽”进城的利与弊

所谓“穿衣戴帽”进城,就是农业劳动力可以自由进入城市就业务工,但仍保留农村户籍,保留农村的承包田

和宅基地。这样做的好处,一是进城农民还拥有农村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当在城镇失去工作岗位或丧失劳动能力的时候,不至于成为完全失去生产资料的无产者,还能回到原籍,因此有利于在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中保持社会稳定。第二个好处是城市用人单位可以压低农民工的工资,特别是工业企业,由于城乡两种不同的社会保障体系以及非农产业与种植业经济收益上的差距,使降低农民工工资和社会保障水平成为可能,这也是中国劳动力便宜的比较优势得以维持的体制性基础。

农民“穿衣戴帽”进城的弊端:一是继续维持城乡人口的二元结构,工业化与城镇化仍然不同步;二是降低了土地利用效益,宅基地难以集约利用,农村住宅空置,进城农民居无定所;三是增加了农村耕地流转的难度,土地规模化经营难以推进,继续保留小农经济生产方式;四是难以造就高素质的产业工人队伍。

3. 农村人口稳定转移和城镇化的条件

如何在保持社会稳定的前提下,实现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同步推进,这不仅仅是户籍制度问题,更难解决的是城镇稳定的就业机会和建立全覆盖的社会保障体系问题。促进农业人口向城镇转移的经济基础和制度安排,主要应解决两大难题:一是城镇非农产业的发展,保障农村剩余劳动力有稳定的就业机会;二是为进城务工农民建立与城镇户籍人口同等的社会保障体系。

4. 推进城乡一体化不能超越经济发展阶段

中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城乡差别将长期存在。在中国现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社会经济体制条件下,不可能实现城乡居民在就业、教育、医疗、养老、住房以及公共基础设施共享等领域的真正意义上的城乡一体化。城乡一体化必须量力而行,尤其要避免在城乡一体化的口号下占用基本农田。

此外,目前全国农村户口约 22500 万户。从农村到城镇务工的农民约 23000 万人。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的转移意味着谁来种田。出路是:在保持家庭土地承包权不变的前提下推进土地流转,实现规模化耕种;促进农业社会化生产和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促进农业机械化;加强农田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业生产条件;促进科学种田;继续坚持惠农政策。

The Problems Confronted by Stabilizing Economic Growth and Adjusting Economic Structure

LV Zheng

(Economics Department,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Beijing 100836)

Abstract: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condition has changed so greatly that the tendency of economic growth has shifted from high-speed to mid-speed. To ensure steady and robust economic development, fix capital investment must be kept in a moderate degree, and domestic demand must be expanded effectively. Adjusting economic structure is not only based on comparative advantage, but also on strengthening competitive advantage. While energetically fostering 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ies, the big gap in the existing industries between China and the developed countries must be narrowed through benchmarking. The development of service mainly lies in the objective situation of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s also restricted by the policy environment. The key to solving the problem of the dual structural in urban and rural economy is that the work forces transferred from rural areas have steady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and be covered by the social security system.

Key words: Economic Growth; Structure Adjusting

责任编辑:魏小奋